

# 今年中国经济面临什么样的局面

连平

随着疫苗问世并普及投放，全球疫情很可能在2021年年中前后出现拐点，随后世界经济可能于下半年走向

整体性复苏。在经济复苏和基数效应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经济在2021年一季度可能呈现较高增速，甚至超过两位数，二季度后会逐步放缓。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达到8.8%，总体上呈现前高后低之势，稳步回归趋势性运行水平。

虽然中国经济在2020年走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一抹亮色，但仍需要警惕经济运行中的局部风险：一是银行业局部不良资产压力可能增大。疫情对资产质量的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性。银行出于审慎经营原则，将继续做实不良分类、夯实资产质量基础，预计不良生成速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2020年推出的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在2021年都将会退出。二是部分房地产企业存在资金链断裂的风险。2021年房企融资环境相对偏紧，部分经营不善的房企存在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三是债券市场仍可能发生局部违约。超预期的信用风险可能会导致流动性风险。而市场利率仍有可能阶段性上升，引发债券市场局部违约继续发生。四是股市和汇市大幅震荡和联动产生扩散效应。鉴于经济复苏存在阶段性或局部性的不确定性、疫情可能反复，资本

市场可能面临阶段性短期扰动。有必要警惕人民币过度升值并产生连锁反应。过快的升值可能带来热钱涌入以及出口增加较大压力，而过多的资本流入不仅将冲击我国的经济秩序和货币政策执行效果，资本流入的“急停”和逆转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笔者认为这样的宏观政策基调具有较好的针对性和适配性，下一步的关键是要落到实处。

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为推动消费更好的恢复，增加教育、科技、城乡社区事务、节能环保、文体旅游传媒等项目的支出。为了支撑扩大内需战略，未来可以探索推进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制改革。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应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信贷和社融的增长从疫情发生之前的与名义经济增长基本匹配到转为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经济增长匹配，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潜在产出的波动相对较小，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GDP就是在潜在产出的基础上考虑GDP平减指数的影响。2021年，信贷和社融都应保持平稳的、常态的增长，实体经济融资利率平稳下行。

2021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和下调的必要性都很小。目前银行存款增速低于贷款增速，在这种情况下，调高存款准备金率是不合适的。此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有可能带来银行流动性过度偏紧的结果，同时也很有可能抬升银行贷款利率，尤其是会制约银行业向实体经济投放信贷的能力，增加后者的融资成本。

2021年，房地产金融政策已经显现严格规范的端倪。从金融源头管理需求，控制大城市房价上涨压力可能是较为有效的举措，但需要把握好时度效。

应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一城一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地产调控政策重点在于严防利用消费贷、首付贷资金违规加杠杆行为；对房企加强融资管控，包括贷款、信托及境内外债券融资。针对大城市住房供求关系的不平衡，采取限购限贷限价等调控措施，加大租赁住房供给建设；从长远看，应推进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增加大城市土地和住房供给，从供需两端出台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运行。

岁末年初，股票市场连续上涨，成交量稳步扩大，市场对2021年股票市场寄予了良好预期。2021年中国经济将持续复苏，加上低基数因素，实际GDP增速可能较高；宏观政策将保持对经济的必要支持力度，流动性将保持合理充裕，利率水平较为平稳；经常项下顺差增速较高，资本流入步伐加快，人民币波动中升值态势明朗；企业盈利大幅改善，A股估值处在合理水平；国家从战略上支持直接融资，持续推出支持和呵护资本市场政策。可见，当前的股市上涨是有理由的。下一步的监管和调控需关注非合规资本进入股市，引导市场支持国家政策和战略导向的产业，培育和引导市场主体秉持风险中性理念。▲（作者是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 国际反恐形势因疫情更趋复杂

刘中民

1月2日，不明身份的持枪者袭击了尼日尔西部的两个村庄，造成约100人死亡。这一事件使疫情下相对沉寂的国际恐怖主义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事实上，2020年的国际反恐形势貌似受到疫情的抑制，事实上却仍暗流涌动，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恐怖主义借疫情掩护反弹的情况。美国等国家反恐政策的功利化和消极化也使国际反恐形势更加复杂。

需要看到，当前全球恐怖主义在疫情掩护下悄然复苏。一方面，因为疫情的缘故，世界在2020年并未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另一方面，各国都在将人力、物力和财力转向抗击新冠疫情而减少反恐投入，恐怖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国”得以在暗中重建，而美国受新冠疫情、大选以及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等因素的影响，其反恐政策日趋消极和功利，也助长了恐怖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固有冲突久拖不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等新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也为恐怖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为“圣战”分子跨国流动提供了条件。而且，疫情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尤其是民生危机，从长期来看更有利于恐怖组织的人员招募。受此影响，中东和南亚恐怖势力的复苏重建乃至恐怖袭击反弹的势头不容小觑。此外，欧洲右翼势力和激进伊斯兰势力的恶性互动也使欧洲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痼疾持续加深。

中东、南亚、非洲恐怖组织、极端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恐怖袭击反弹的势头值得关注。在伊拉克，从2020年3月开始，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军队陆续撤出，伊拉克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抗击疫情，这些都为极端组织的重建和反弹提供了可乘之机。据统计，2020年1月至8月，“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共制造292起袭击事件。伊拉克西部与叙利亚接壤地区、北部和中部山区成为“伊斯兰国”活动的重要区域。当前，“伊斯兰国”组织技术及战术更为精进，危险系数也更大，且通过各种方式在筹措资金，重建组织。据联合国一份最新报告，目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成员仍多达1.8万人，其中有5000-6000名武装分子，其余都是潜伏组织和同情者。该组

织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区域分支机构继续招募追随者的能力有增无减，而且通过社交网络得到全新的支持。

在南亚的巴基斯坦，2020年1-8月发生了221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占全国公共安全事件总数的56%，俾路支省及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简称“开普省”）是恐怖主义的重灾区，袭击对象包括政府部门、军警人员，宗教场所和大型市场等人员聚集性场所，且大都带有政治、民族或宗教色彩。此外，受美国“阿富汗塔利班”和解谈判的影响，活跃在阿巴边境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向巴境内回缩的趋势日趋明显，这也导致巴基斯坦反恐形势的复杂化。

美国反恐政策日趋消极和功利，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深入研判。第一，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撤军，尽管不同时期维持有增有减的弹性政策，但其总体趋势是继续收缩，当前伊拉克反恐形势的恶化与此密切相关。第二，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又拉又打的政策，难以实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的稳定，甚至不排除塔利班的分化以及南亚极端势力的重组。第三，美国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军的“国家恐怖主义”做法，以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以色列肆无忌惮的偏袒，置巴勒斯坦权益于不顾强势推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等行为，都是刺激恐怖主义的消极做法。第四，美国把中国的反恐、去极端化政策与人权问题挂钩，对我们横加污蔑和指责，是把反恐与人权挂钩作为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工具。

欧洲的情况也令人担忧。2020年11月，法国、奥地利相继发生恐怖袭击。欧洲恐袭事件频发的外部因素是“伊斯兰国”在中东遭受沉重打击后利用难民潮向欧洲渗透，内部因素则在于欧洲国家长期积累的穆斯林族群与主流社会的关系问题，各国政府政策失当尤其是右翼势力与激进伊斯兰势力的恶性互动，导致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右翼极端分子制造的恐怖袭击成为难以根除的痼疾，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尤其是“独狼式”恐怖活动，已成为欧洲最棘手的恐怖威胁。▲（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美国新政府即将上台，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当下，中美面临严重信任赤字，既往100多个对话交流机制已悉数暂停。重构中美关系，可搭建更多对话桥梁，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增进双边合作，并利用社会各界力量推动双方交流。

首先，面对新冠病毒变异传播、多国日确诊病例再创新高、严峻形势，中美可推动建立全球抗疫基金，为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作用及中美等国协作抗疫募集资金；可在G7基础上加上中国、印度、俄罗斯，召开G10国家疫苗峰会，商谈协作疫苗研发产销及分捐等，在世卫组织统筹领导下

美国加入RCEP，共同商议构建亚太地区经贸规则。

第四，中美及朝韩可召开四方会谈，推进朝鲜半岛问题解决。美朝对话此前陷入僵局，在六方会谈失效背景下，中国、朝鲜、韩国和美国可举办四方会谈，推进各方就半岛核问题形成分阶段、分步骤解决共识。在此过程中，美朝可适时重启对话，中美也可在斡旋朝鲜半岛问题中增进政治对话及互信。

中美加深交流有利于双方正确看待差异，妥善处理分歧，实现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中美在官方层面应争取恢复一些高层对话机制，也可建立新的中美欧对

## 中美重启合作有四个突破口

王辉耀

为欠发达国家疫情防控提供更多资金、物资、技术及人员支持。疫情持续对世界经济及国际金融造成严重冲击，中美也应像曾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那样共同筑起经济危机防洪坝，保障世界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

其次，中美共同应对气候危机合作空间巨大。中美均是碳排放量大国，在国际碳交易机制完善、清洁技术及能源研发应用、气候灾害防治等方面可以开展合作，还可效仿中欧建立数字经济及绿色合作双边会议等。

第三，中美可就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及WTO改革等展开经贸对话，共同完善全球经贸规则。拜登上任后可能重返CPTPP，中国则可尽早启动加入CPTPP的谈判，为中美交流搭建新平台。同时，除推进WTO改革外，中美还可重启投资协定谈判。中美BIT谈判在2008年启动后，迟迟未能达成共识，随着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完成，中美可重启投资协定谈判，在着力协商双方分歧的同时化解一些合作难题。此外，欢迎

话机制，协调应对中美欧关系及一些全球治理议题。智库等非政府组织因其非官方性质具有较高灵活性，又因其专业度可有效沟通中外，向双方传递彼此意图，可在中美二轨外交中发挥重要沟通连接作用。此外，良好的青年联系可为健康的中美关系注入活力，年轻人尤其是青年领袖应在中美交流中发挥更多作用，国际社会应有更多青年交流机制。中美既往人文交流频繁，疫情过后可放宽入境限制，欢迎更多美方人士来华留学、旅游，进行文化及学术交流等，使其各年龄各领域人士可通过深入接触更好了解中国。

在20世纪，世界曾分裂为美苏两大阵营，双方军备竞赛不断，民众相互敌视，其消极影响至今仍盘亘在部分人脑海中，使其深信国际竞争就是你死我活。进入21世纪，中美“脱钩”“分裂”言论频起，逆全球化潮流汹涌，全球化又走到十字路口。但中美关系并非美苏关系翻版，中美可建立良性竞争，围绕全球治理难题展开更多双多边合作。▲（作者是全球化智库[CCG]主任）